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西方框定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蔡文成 牟琛

**内容提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的同时,也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负面框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西方判定该理念是中国谋求世界霸权的话语表征,在此基础上,期望并借助国际话语霸权抵制中国理念的全球传播,动员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力量维护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其影响而言,西方国家对中国及其理念实施的框定已显示出国际涉华舆论巨大的操纵力,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为此,中国应从揭露西方框定的真相入手,既要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主体性框架,提高中国理念的国际认同度;也要拥抱与中国具有相似叙事框架的国家,形成反西方框定的联合力量;更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西方反华势力阻挠中国发展进程的幻想。

**关键词** 西方 框架理论 中国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性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递出的合作共赢、安危与共的运作价值(operating value)符合当前全球时空环境的整体发展态势(全球化),是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已然开始、人类共生程度愈发加深的前提下,为探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解决全球性人类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sup>①</sup>十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由理念转化为运作性倡议与全球性实践,全球认同度不断提升。不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理念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的同时,也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抵制与污名化。<sup>②</sup>中国近期提出的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遭到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傲慢对待,对中国倡议的提出动机与可行性表示怀疑。<sup>③</sup>在运作方式上,西方主要采用框定(framing)的诠释与传播策略,对人类命运共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保密项目,编号:21@WTG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建构研究”(编号:22lzujbkys004)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罗圣荣、张新、廖宏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实践阻力及优化路径》,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

② 参见王雪冬:《西方国家歪曲抹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几种论调及辨析》,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祝尚珍、吴志远:《美国智库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影响及应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载《智库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

③ Yu Jie, “Climate Jus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tham House*, November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1/climate-justice-chinese-characteristics>; “Xi’s New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ly 2022, <https://www.csis.org/events/xis-new-global-security-initiative>; “China Unveils its Vision of a Global Security Order”, *The Economist*, May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2/05/05/china-unveils-its-vision-of-a-global-security-order?gclid=EAIaIQobChMI\\_MbCiP3J\\_QIVKsBMAh2npg1pEAYASAAEgIgevd\\_BwE&gclid=aw.ds](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2/05/05/china-unveils-its-vision-of-a-global-security-order?gclid=EAIaIQobChMI_MbCiP3J_QIVKsBMAh2npg1pEAYASAAEgIgevd_BwE&gclid=aw.ds).

体等中国理念进行再叙事和再阐释。由于框定作为一种认知操纵力和行动塑造力极强的政治传播策略,一旦被广泛运用到国家间舆论博弈与战略博弈中,将会对国际涉华舆论环境和国家外部发展环境造成危害,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西方框定中国理念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理念的框定流程具体如何运作?此种框定将会产生何种消极影响?当下我们又该如何理性应对西方对中国理念的负面框定?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 一、框架的理论阐释与类型划分

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较早出现于社会学、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框架理论的提出者戈夫曼强调,框架是人们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解释图式与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理解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sup>①</sup>戈夫曼强调的框架实际上为行为体提供了一种认知的情境和视角。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认知结构和观念偏好作为一种前置性装置,影响着行为体对经验对象的判断和行动。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框架的建构性意义逐渐凸显,即媒体框架、政治框架抑或精英框架会激活或塑造受众的某种信念、观念与态度偏好,驱动受众接受某种观念(如针对某一议题的观点与立场、态度)、采取某种行动(如参与集体性的运动),进而产生一定的社会结果和影响(如针对某一议题的政策合法性的提升与法案的通过)。具体而言,框定(framing)主要是通过赋予事件或发生的情况以一定的意义,从而对个人或集体的行动起到辩护性和指导性作用。<sup>②</sup>按照塑造目标群体认知、动员目标群体行动的一般过程,框定主要包括诊断式、处方式与促发式三种类型。<sup>③</sup>其中,诊断式框定是指界定受害者,查明问题的原因以及明确导致结果的施动者;处方式框定则要求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促发式框定则是试图唤醒目标群体的某种特定意识,明确描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驱动目标群体采取某种行动。

此外框架的调整为框架共鸣创造可能,具体包括桥接、放大、扩展和转换等手法。<sup>④</sup>其中桥接可理解为联系,是指将深层隐喻上一致而结构上并不相联系的框架组合起来以处理特定指涉对象或问题,而且一旦受众长期、反复受到某类解释的影响,受众关于某一经验对象的认知图式则极易固化。增强是指框定者通过价值增强和信念增强的方式强化既有框架的共鸣性。这实际上是一种迎合受众群体偏好的认知塑造策略。延伸是指框定者为增强框架的动员力和吸引力,扩大框架的利益、问题或价值关涉边界,将受众囊括到命运与共的时空背景中。转换则是指框定者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将事件、议题等框定对象进行解构—重构,以先抑后扬或欲扬先抑的方式颠倒黑白,从而赋予对象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看,框定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传播策略,具有塑造认知、规划方案、号召行动以及构建行动合法性等功能。该策略在工具性维度具备较为统一的框定类型,从类型化分析切入无疑有利于简化管理与厘清西方判定和对待中国理念的复杂现状,而且框架理论具备较为完备的框

<sup>①</sup>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21.

<sup>②</sup>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7-473.

<sup>③</sup>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no. 1, 2000, pp. 611-639.

<sup>④</sup> 关于框架调整的手法及其在国际涉华舆论博弈中的应用可参见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7-473; 林斯嫻:《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框架策略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期;王翠梅:《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架共鸣评估体系与框架互动策略,<sup>①</sup>可为后续评估西方对中国理念框定之影响以及优化应对策略提供新思路。

## 二、西方对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框定流程

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与行动在初期虽较为多元,但随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西方对中国理念愈发抵制与排斥。<sup>②</sup>从发生过程来看,近期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理念的认知与行动可理解为一种接受刺激—进行解读—做出反应的社会运动,其中以“解读”为中心实施框定的过程尤为关键,这是因为它横亘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有着极强的使动性(认知塑造功能)、斗争性(行为驱动功能)和动态性(策略优化功能)。<sup>③</sup>当前,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理念的框定在逻辑上大致经历了诊断式框定(定位归因)、处方式框定(行动规划)与促发式框定(思想动员)三个阶段,并付诸了相应的行动。

### (一) 诊断式框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谋求世界霸权的表征

在知识社会学视域下,“任何知识都预定了并建构着权力关系”<sup>④</sup>,理念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体现与欲望表达。当前西方对中国理念的理解亦建立在对中国的研判之上。面对崛起中的“复杂”中国,为维持现代自我的认同和想象,满足自我的确定性欲望,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恐惧、幻想等非理性情感和欲望的支配下,逐渐认定中国这一“他者”对西方文明以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具有威胁性。正因如此,西方没有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为中国为化解全球治理难题、应对全球重大危机的中国方案,反而开始“选择认知事实的某些方面,使其变得突出”<sup>⑤</sup>,在“文明—野蛮”与“自由—强权”框架下将中国提出的理念塑造成具有威胁性的他者理念,是中国谋求地区—世界霸权的符号和象征。<sup>⑥</sup>

在官方层面,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暗示中国理念是中国试图“敲碎”自由主义世界图景的话语表达。例如2020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明确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主张(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作对美国价值观的挑战。<sup>⑦</sup>2021年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认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sup>⑧</sup>;2023年《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则称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对西方价值观、利益和安全造成挑战<sup>⑨</sup>。在叙事策略上,西方此类涉华文本基本采取了框架增强的手法,渲染中国倡导的价值

<sup>①</sup> See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no. 1, 2000, pp. 611–639.

<sup>②</sup> 参见王义桅、江洋:《西方误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维分析:利益、体系与思维——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道》,载《东南学术》,2022年第3期。

<sup>③</sup> 参见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sup>④</sup> 夏光:《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0页。

<sup>⑤</sup>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no. 1, 2000, pp. 611–639.

<sup>⑥</sup> 参见汤景泰、史金铭:《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载《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

<sup>⑦</sup>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May 2020, <https://2017-2021-translations.state.gov/2020/05/20/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dex.html>.

<sup>⑧</sup>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sup>⑨</sup>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European Council, January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1/10/eu-nato-joint-declaration-10-january-2023/>.

观与理念与西方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对立性与冲突性,突出中国对国际秩序稳定的威胁性。

在精英层面,不少西方研究机构及其学者对等中国理念和倡议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如大西洋理事会 2022 年发布的《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话语权运作》研究报告采取了框架延伸的策略,一方面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话语在增进中国全球话语权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却多次对中国赋以“专制政权”“限制话语空间”等具有负面暗示意义的符号。<sup>①</sup>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愿景》研究报告则采取了框架转换的策略,在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好意涵的同时,却逡巡于陈旧的“天下”朝贡体系,认为中国正在追求地区性的“有限霸权”,从而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怀疑态度。<sup>②</sup>

在媒体层面,西方主流媒体普遍污名化中国及其提出的理念倡议。例如《华尔街日报》在《新北京—莫斯科轴心》一文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谋求领导世界的野心的体现。<sup>③</sup> 此外西方网络运营者如推特(Twitter)也经常以“违反价值观”为由,删除客观陈述涉华事实的账号和推文,并通过算法推荐的特有优势,允容西方反华势力借助社交机器人和代理人生产和转发大量虚假涉华信息。<sup>④</sup>

## (二) 处方式框定:西方世界应联合抵制中国理念的全球扩散

处方式框定主要涉及“如何做”的实践问题与方案问题,即通过考察、整合自身的资源规划某项特定行动。由于当前中国被视为西方的威胁,西方则必须联合起来遏制中国崛起,对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采取抵制性行动。在现实层面,西方特别是美国正在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和权力优势,在经贸、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全领域对中国及其行动进行全面的施压。从局部来看,为降低中国理念的国际合法性,塑造对中国理念的国际共有认知,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阻挠中国理念嵌入国际社会结构。

首先,西方国家依靠在议程设置、规范塑造、规则制定、倡议动员以及制度性理念提供等方面的制度性权力,<sup>⑤</sup>反对中国理念嵌入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之中,阻挠中国理念成为国际共有观念。例如 2019 年以来以“五眼联盟”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多次反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等联大决议中,主张对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的有关段落进行分段表决,并在 2020 年 9 月联大起草的《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宣言》决议草案中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sup>⑥</sup>,并尝试采取胁迫外交的方式阻挠多家国际机构参与中国倡导的国际发展议程,如美国阻挠多方参加 2022 年 5 月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高级别视频会议。<sup>⑦</sup>

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大量散播关于中国理念的负面言论,呼吁西方和国际社会抵制中国的理念倡议。例如在美国对华舆论战略中,国际组织公共外交办公室等外交部门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培

① Kenton Thibaut, “China’s Discourse Power Opera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Atlantic Council, April 2022,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chinas-discourse-power-operations-in-the-global-south/>.

② Nadège Rolland, “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August 2020, [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87\\_aug2020.pdf](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87_aug2020.pdf).

③ Yaroslav Trofimov, “The New Beijing – Moscow Axi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new-beijing-moscow-axis-11549036661>.

④ 王一同:《“影响力行动”揭美虚假信息传播冰山一角》,载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905/c1002-32519751.html>.

⑤ 韩雪晴:《理性偏好、共同体意象与国际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载《欧洲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⑥ 《联大一委三项决议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http://un.china-mission.gov.cn/chn/zgylhg/cjyjk/202211/t20221104\\_10800094.htm](http://un.china-mission.gov.cn/chn/zgylhg/cjyjk/202211/t20221104_10800094.htm).

⑦ 《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植各国对中国的警惕性,培植海外民众与精英对中国及其理念倡议的负面认知,<sup>①</sup>同时依靠国际媒体署,有序引导西方媒体发布涉华负面信息,而且国防与情报机构也为动态调整对华舆论攻击策略提供情报与数据支持。<sup>②</sup>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中,媒体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之间存在共栖关系。依靠这种共栖关系,诸多反华法案和污华论调可以在主流媒体报道下受到大量关注,获得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支持。<sup>③</sup>例如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于2023年2月28日晚间黄金时段举行首次听证会,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等政客重点向美国人通报中国“构成的威胁”并提出反制言论。<sup>④</sup>

最后,与“新麦卡锡主义”保持相对一致的西方学者特别是从事政策研究的智库型学者,也在不断建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在其涉华系列评论中,经常采取框架增强和框架桥接的方式,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与倡议理解为中国谋求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的信号,并强烈建议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中国理念“对外输出”。<sup>⑤</sup>不过西方学界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并非只有对抗一种声音,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在2022年中美关系研讨会上批评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过度反应。<sup>⑥</sup>近期以来部分美方智库也主张对话合作,寻求中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sup>⑦</sup>

### (三) 促发式框定:西方世界需动员社会力量实现对国际秩序的护持

促发式框定主要完成对框架对象的行动动员,具体可通过突出问题对象的严重性以及谋划未来行动的有效性来达成。<sup>⑧</sup>当前,为调动资源和使用权力对具有他者性和威胁性的中国理念及其国际传播进行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必须说服西方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协调行动以促成护持霸权、维护秩序等目标的达成。

从威胁渲染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部署涉华战略传播活动,在制度、价值观以及发展模式等软实力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和博弈。例如“中国威胁论”“中国锐实力论”在西方全政府、跨部门协作下,在西方媒体的持续扩散和西方学界的持续炮制下,一度成为西方涉华舆论焦点。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框架增强的手法,将中国与美国标榜的普世价值划界,刻意造成中国与所谓“民主自由国家”之间的身份差异和价值差异,指责中国正进行全球势力扩张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输出,呼吁西方和国际社会以“无畏”的信念和“救世”的心态捍卫“自由世界”,从而达到激发西方受众乃至全球受众对中国及其理念的恐惧和敌意等险恶目的。<sup>⑨</sup>

① “2022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U. 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 December 2022,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FINAL\\_2022\\_ACPD\\_AnnualReport\\_508Ready.pdf](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2/FINAL_2022_ACPD_AnnualReport_508Ready.pdf).

② 原明:《美国对华舆论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载《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2期。

③ 王达:《美国对华意识形态遏制升级的实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④ Chelsey Cox, “U. S. House China Panel Holds First Hearing after Lawmakers Push Seven Bills Targeting Beijing”, *CNBC*, March 2023, <https://www.cnbc.com/2023/02/28/watch-live-us-house-china-panel-holds-first-hearing-.html>.

⑤ Jude Blanchette, “The Case of Xi Jinping”, *The Asan Forum*, <https://theasanforum.org/the-case-of-xi-jinping/>.

⑥ James Gethyn Evans, “The Future of U. S. -China Relations: Competitio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December 2022, <https://fairbank.fas.harvard.edu/research/blog/the-future-of-us-china-relations-a-summary-of-coexistence-2-0/>.

⑦ 《中美关系进入新“窗口期”? 美国智库这样研判》,载《环球时报》,2023年8月29日,第7版。

⑧ Robert D. Benford, “‘You Could Be Hundredth MonKey’: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67, no. 2, 1993, pp. 195-216.

⑨ 参见曾向红、李琳琳:《新冠疫情跨国扩散背景下的西方对华污名化》,载《国际论坛》,2020年第5期。

从图景描述来看,当前美国正以民主价值观为行动旗帜,联合更多国家建立起针对中国的价值观联盟,以期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试图强化同盟—同质—同命运的共有身份,维持在全球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等领域中的垄断性权力和主导性身份,维护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例如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上台之前就强调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向世界表明美国将“确保是美国而非中国……制定新的全球规范和协议,以促进我们的利益并反映我们的价值观”<sup>①</sup>。

总的来看,西方既完成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的定位和判定,也完成了对中国理念应对方案的设想,并强调为降低中国及其理念对西方和国际的影响,应做好反华的思想动员工作。不过西方对于中国及其理念也并非一种声音,而且即便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存有理解与表述差异甚至丑化的举动,仍需尊重与理解不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并且需要精确研判与批判反思对手及伙伴发出的反馈信号。例如在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之时,查塔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杰认为,中国应专注于为 GDI(全球发展倡议)受援国提供真正有益的优质项目,制订明确、具体的行动计划以提高 GDI 的清晰度和可信度。<sup>②</sup> 对中国而言,如何不断健全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机制、不断明确行动路线、不断推进务实合作正是增强中国及其理念国际影响力的关键。

### 三、西方框定中国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面影响

当前,西方框定中国及其理念产生的负面影响,取决于西方创设的框架所能引起的共鸣度。根据学者罗伯特·本福德(Robert Benford)与戴维·斯诺(David Snow)的评估方法,框架共鸣一般用框架可信度(credibility)和相对显著性(relative salience)来衡量,前者一般用框架一致性(框架内部的逻辑自洽性以及框架主张与行动的契合性)、经验可信度(框架与现实事实的吻合程度)、框架阐述者或主张者的可信度来衡量;后者则由集中性(框架与受众核心价值偏好的关联度)、经验可通约性(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迎合个体的日常体验与认知)和叙事的逼真性(框架表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受众的文化背景)三个指标来确定。<sup>③</sup> 下面将从这些主流评估指标对西方框定中国理念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分析。

#### (一) 框架可信度维度

从框架的一致性来看,西方普遍将中国理念视为中国崛起之际试图颠覆国际秩序的话语表达或外交辞令,但这一观点由于与现实可感知的经验对象不符,因而在国际社会引发集体共鸣的能力有限。首先,中国崛起不是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中国提出的全球性理念是霸权性理念或伪装性理念也是伪命题。事实上,中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提供理念型公共产品(如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型公共产品(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实际行动也逐渐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sup>④</sup> 其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不能完全代表国际秩序的时空形态,试图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是以美国霸权为主宰、西方规则为基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单极

<sup>①</sup> 刘国柱:《复合型模块化联盟:拜登政府应对大国竞争的联盟战略》,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Joseph R. Biden, Jr.,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9, no. 2, 2020, p. 67; Joseph R. Biden, Jr.,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Th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sup>②</sup> Yu Jie, “Climate Jus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atham House, November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11/climate-justice-chinese-characteristics>.

<sup>③</sup> 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no. 1, 2000, pp. 611–639.

<sup>④</sup> 王毅:《矢志民族复兴,胸怀人类命运 奋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载《求是》,2023年第1期。

秩序<sup>①</sup>的西方国家掩盖了国际秩序动态演化的特性,<sup>②</sup>刻意忽视了非西方文明兴起以及当前国际秩序不公正不合理的事实。

从经验可信度来看,西方对中国理念的污化论调绝大部分是缺乏事实支撑的。例如有关“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论”不符合数据事实。有关研究显示,截至2018年中国对非洲的官方贷款存量约800亿美元,但仅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债务总额的21.9%,而且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现状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历史成因,将债务风险问题归咎于中国是不合理的。<sup>③</sup>由此可看出,西方负面框定中国及其理念话语的效果受到大量事实的冲抵,因而不具备高度的国际吸引力。不过随着中美大国竞争态势的加剧,美国对中国理念倡议日益加深的负面认知可能会增加地区和全球层面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容易造成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采取对冲策略,对中国理念、倡议,特别是非经济类的倡议持谨慎、沉默或灵活的态度。如东南亚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积极认可,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总体反应却相当矛盾和谨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克东南亚研究所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2023》显示,只有44.5%的受访者对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有信心或认为能给东南亚带来好处。<sup>④</sup>

从框架阐述者或主张者的可信度来看,诸多框定者是拥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社会号召力的西方政治精英和主流媒体、权威研究机构。这些群体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偏好和意识形态广义化(如冷战思维的延续)的思维特质,在非伪装意义上更是缺乏一定的批判性反思能力。<sup>⑤</sup>正如学者朱云汉所言,“西方政治学者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的窠臼,美国政治学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行动者。他们完全不能理解中国领导人倡议的‘义利之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⑥</sup>这种以区隔与对立为特征的“他者化”思维定式,投射在心理与情感层面则体现为对崛起中的中国有着强烈的不确定心理和盲目对华寻求虚假确定性的非理性冲动,在话语层面则体现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对华“自我想象”的出场。<sup>⑦</sup>在此种态势下,这些西方群体炮制的涉华论调,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以及在全球信息流散中的绝对优势与长期经验,给中国外交工作和国际传播工作的有效开展带来了极大困难。

## (二) 框架显著性维度

从集中性来看,西方善于将中国赋予“威权”“极权”等自传性意象,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的个体主义观念,唤醒了西方对冷战、对苏联的负面历史记忆,从而激发了西方对“极权中国”“威权中国”的深深恐惧,使得西方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理念话语的形象认知趋向负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冲抵了中国外宣工作、国际传播工作的效果。

从经验可通约性来看,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支撑下,西方持续塑造涉华信息的全球“信息茧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理念的认知。有研究指出,泰国、缅甸等东南亚民众之所以对“一带一路”等中国理念的认知偏向负面,在于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多是通过西方媒体间接获得的;而且虽然中国外宣媒体一直试图通过和当地新闻机构合作来动摇西方媒体的媒介

① 张建新、董雅娜:《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载《国际观察》,2022年第6期。

②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③ 刘倩:《“债务陷阱论”:罔顾事实的无稽之谈》,载《光明日报》,2022年5月5日,第15版。

④ “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2023 Survey Repor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February 2023,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5/07/The-State-of-SEA-2023-Final-Digital-V4-09-Feb-2023.pdf>.

⑤ 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

⑥ 朱云汉:《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载《经济导刊》,2019年第11期。

⑦ [澳]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权力和欲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霸权,但尚未实现预期效果。<sup>①</sup>

从叙事逼真性来看,西方框定中国理念有着迎合特定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叙事的特点,比如框定延伸、框架增强手法迎合了西方“中心”“救世”的心态,因而相应框定策略极具煽动性和误导性,从而提升了西方涉华舆论和国际涉华舆论的影响力,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sup>②</sup>、中欧亚研究所(CEIAS)<sup>③</sup>的民调显示,近年来日韩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普遍较为负面,而且多至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正是这些反华的民意基础的存在,诸多高强度、严标准的反华法案得以在西方国家获得合法性支撑。已有研究表明,美国公众关于“中国威胁”的心理认知迅速加强并形成共识,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社会心理基础。<sup>④</sup>

总的来看,西方对中国理念负面框定中的绝大多数观点与论调经不起证伪与推敲,因而降低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仍对契合自身安全与发展诉求的中国理念、倡议以及中国践行理念、倡议的行动持有认可之意。<sup>⑤</sup>不过在百年话语霸权的强力支撑下,在百年舆论博弈的经验加持下,在百年观念输出的持续塑造下,西方主导构建的涉华框架具有相对显著性,这不仅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的错误认知和反感情绪,夯实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强硬表达与行动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理念的国际合法性,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合作。

#### 四、理性应对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话语的负面框定

可以预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或者至少美国对华打压遏制的趋向不会发生较大改变,而且由于“由于话语和象征领域的斗争远比其他领域的斗争更加难以识别、影响更加深远”<sup>⑥</sup>,以及大国竞争背景下合理的战略叙事对“降低战略成本、推进安全化框定和提升战略说服力”<sup>⑦</sup>的积极意义,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实施框定的方式方法和力度强度也可能持续增加,其负面效应也将持续累积和外溢。为此,中国需要采取必要策略,有理有力地予以审慎应对,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一) 揭露西方对中国理念实施框定的事实与目的

当前西方对华及其理念话语实施框定有着诊断—行动—动员的框定程序和诸多框定策略,以服务于打压他者、维持国际主导者意象、护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体意志和强烈欲望。为此,中国需要充分揭露和批判西方对华框定的技术性、政治性等特性。

<sup>①</sup> Song, Y., Qiao-Franco, G., Liu, T., “Becoming A Normative Power? China’s Mekong Agenda in the Era of Xi Jinp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4, 2021, pp. 1709 – 1726.

<sup>②</sup> Laura Silver,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

<sup>③</sup> Richard Q. Turcsányi, “Survey: Europeans’ Views of China in the Age of COVID-19”, *The Central Europe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arch 2021, <https://ceias.eu/survey-europeans-views-of-china-in-the-age-of-covid-19/>.

<sup>④</sup> 庞琴:《中美权力变化与美国公众对“中国威胁”的认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

<sup>⑤</sup> 参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新华社, [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69.htm](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69.htm);《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新德里宣言》,新华社, [http://www.news.cn/world/2022-07/05/c\\_1129732703.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7/05/c_1129732703.htm);《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全文),新华社, [http://www.news.cn/world/2022-06/24/c\\_112877100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6/24/c_1128771000.htm);《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全文),新华社, [http://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社,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20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wjwb\\_673085/zjzg\\_673183/gjjs\\_674249/xgxw\\_674251/202306/P020230620670372006993.pdf](https://www.mfa.gov.cn/web/wjwb_673085/zjzg_673183/gjjs_674249/xgxw_674251/202306/P020230620670372006993.pdf).

<sup>⑥</sup> 曾向红、李琳琳:《西方对华舆论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载《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0期。

<sup>⑦</sup> 曹德军:《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叙事——中美外交话语博弈及其叙事剧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5期。

中国首先应在技术性层面挖掘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倡议实施框定的基本运作流程和具体框定策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揭露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倡议解构、重构的事实真相;其次,中国应充分揭露西方框定主体的身份背景和受资助背景,明确框定主体之间隐秘的意识形态联系和内在勾连,揭示西方媒体运营者在全球涉华信息推送、过滤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揭示西方对华“计算宣传”的运作流程。<sup>①</sup>最后,中国相关的外宣外事部门和国际传播媒体,应利用多种外交场合和对外传播渠道,在呈现西方框定流程策略和西方框定主体联动态势的同时,及时向国际社会讲述西方对中国理念实施框定、试图消解中国理念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用心,揭露西方维持国际秩序主导权、打压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目的。

当前,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环球时报》、中国外交部等中国外宣外事主体已经开始灵活回应西方对华污名化。例如新华社制作并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英文微电影《扯牌屋·谁最心机》以模仿美国政治大戏《纸牌屋》的方式,揭露美国种种外交政策的背后目的,引起了海外受众的广泛关注;中国外交部也发布了《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的4万字长文,驳斥美国对华认知的21条谬误。

需要补充的是,揭露与回应是应对西方框定中国及其理念倡议的重要前提,是实现舆论改善与认知优化的重要策略。不过在注意力有限的情境下,囿于他者话语与框架既容易导致注意力分散,也容易带来认识上的自我遮蔽,<sup>②</sup>而且过激的回应也会造成舆论漩涡的生成与扩大。为此,建构主体性框架可能是反框定的关键一招。从理想效果来看,这一策略不仅易于在正向格义中澄清中国理念的真实意涵,也有利于在正向扩散中抵消和对冲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倡议实施框定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又该建立何种主体性框架呢?

## (二) 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主体性框架

面对同一事实,不同的框定主体出于不同目的会建构不同的框架,例如当前西方对中国及其理念实施框定的底层逻辑是满足自我认同以及对他人寻求确定性的欲望,依靠“中国威胁论”等自传性叙事来维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想象。而被框定者可以通过事后调整和重构框定者的原有框架来“防止、遏制、限制或逆转”<sup>③</sup>他者框定带来的损害,或者事前预估框定者可能预设的叙事框架,掌握框架设置的主动权,从而防范框定者的潜在框定攻击。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需要主动设置涉华叙事框架,在事实真相、传播策略的支撑与辅助下,注重开放、包容、融通的主体性框架的搭建。不过构建中国式的主体性框架并不意味着对他者言说的遮蔽和无视,而是试图搭建超越对抗、注重共生、注重互惠的新的规划性框架,在人类中心与国家中心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在交互涵化中寻求共同的利益—意义—情感空间。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及其意涵的多次阐释可以被视为一种框架重构的重要努力。这一中国理念凭借其共生性、开放性、包容性、融通性等本体、认识与方法特性,既创造了自我与他者的有机统一和互利共赢的可能性,在交往理性—关系理性中避免了主体之间的冲突性,<sup>④</sup>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野诊断了全球治理危机的弊端和缘由,并给出了具有“补充性”而非“颠覆

① 蔡文成、牟琛:《“拖钩”的舆论效应:一种政治传播策略的分析》,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8期。

② 孙向晨:《跨文化对话的困境与因应之道》,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3期。

③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7–473.

④ 参见郭树勇、于阳:《全球秩序观的理性转向与“新理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

性”的化解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福祉的中国方案。<sup>①</sup>未来,中国应在揭露西方对华负面框定的事实及用心的前提下,以中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等诸多胸怀天下的事实为依托,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叙事核心的主体性框架,采取叙事共情、议程设定等传播策略,<sup>②</sup>充分讲清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中国关照人类个体一整体利益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希冀,讲清中国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给出的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客观、科学的诊断及具有公平性和有效性的方案,讲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遵循的是“沟通逻辑”<sup>③</sup>(多元国际行为体相互调适理性预期、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以期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理念的正向认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及其理念的认同度,进而缓解西方对中国理念与倡议的狭隘判定带来的舆论影响。

不过,当前“意识形态二分和大国权力接近的结构性背景使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责难居高不下”<sup>④</sup>,而且受到集体记忆、意识形态、背景性知识等诸多观念性—情境性—情感性力量的持续影响,不同文明的个体的基本政治认知图式会和国家形象产生明显的匹配效应,<sup>⑤</sup>所以中国解决舆论博弈中的“被框定”问题以及提升跨国别互动、跨文化沟通、跨文明交流成效仍任重道远,对此中国仍需坚持在国际传播平台的使用、国际传播队伍的建设、对外叙事体系的优化方面下功夫。仅就叙事体系的建设而言,图像叙事有助于减少因文化距离引发的误解曲解,降低内容理解的门槛,应是未来中国对外叙事的重要方向;此外对外叙事的多元化与层次性也要求对外传播中理性叙事、融通叙事与共情叙事相统筹,战略叙事、学理叙事与日常叙事相调和,从而在综合多元叙事优势、做好多元叙事协同的工作中,发挥对外叙事应有的合法性建构、国际形象塑造等功能。

### (三) 拥抱与中国具有相似叙事框架的国家

主体性框架的搭建虽然是抗衡西方框定的关键一招,但“西强中弱”的国际权力格局促使框架主体需要在运作策略(联合策略)上予以细化和斟酌,即在框架扩散过程中主动联合具有相似框架(即相似诉求、意向)的行为体,增强框架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况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全球性社会运动,需要扩大这一社会运动的志愿者同盟特别是增强“全球南方”的行动意愿与行动能力。

当前,虽然广大发展中国家已部分“同意”了西方价值观;<sup>⑥</sup>但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是具有相对一致性的,都试图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自我的生存、发展创设开放性、包容性、舒适度更高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秩序,为维护和增进个体利益甚至为维护和增进地区共同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而积极、主动、负责任、有区别地引领或参与全球治理。<sup>⑦</sup>上述诉求反映在框架层面,则体现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有着较相似的外交话语与叙事逻辑。例如不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带有一定利他主义倾向或温和改革倾向的多边主义理念与反霸权话语,如南非

① 参见刘同舫:《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历史性重构》,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5期。

② 参见李克:《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载《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蔡文成、牟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传播困境及突围策略》,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③ 参见刘铁娃、宗华伟:《多边主义的文明政治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间对话议程述评》,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④ 温尧:《权力与偏见:当代崛起国的治理知识传播难题》,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2期。

⑤ 参见马得勇、陆屹洲:《国家形象形成的心理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1期。

⑥ 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7—10页;殷之光:《宰制万物——来自帝国与第三世界的两种现代时间观及全球秩序想象》,载《东方学刊》,2020年第4期。

⑦ 参见蔡文成、牟琛:《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形成机理——以国际规范扩散为分析视角》,载《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的乌班图思想(Ubuntu)<sup>①</sup>与印度的“改革的多边主义”。而且正是这种叙事框架所反映的诉求相似性以及中国践行理念产生的示范效应,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理念和倡议持认可之意。正因如此,适度且审慎地拥抱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反西方框定的集体性力量和政治性压力,是中国降低西方负面框定影响的必要方式。当前,中国正通过上合峰会、金砖国家峰会、中国—中亚峰会、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等沟通机制,以及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成果清单》等务实举措,加强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与合作。从结果看,这些行动有效地凝聚了共促发展、谋求安全、寻求改革的国际共识,提升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集体行动的可能性。<sup>②</sup>

不过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传导和拉拢利诱,并长期受到西方话语的渗透和塑造,中国需通过增强政治互信、加快经贸合作、深耕人文交流等激励方式做好压力缓解工作和话语融通工作。但是各种激励方式之间关联复杂,且并不总能够相互支撑,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双边政治关系走强,可能需要中国在经济上做出更多让步,以平复对方政府和民众对贸易不平衡状况的不满,促使对方国家在涉及中国的重大政治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sup>③</sup>,所以如何平衡好激励方式及其与目标(集体行动)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此外,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和政治解决地区争端问题上具有合作空间。中国可以在全球治理若干领域与西方特别是与欧盟继续寻求合作甚至利好外溢,并继续通过深化经济相互依赖等多种方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分化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遏制联合阵线”,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部环境。<sup>④</sup>

#### (四) 在保持战略定力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话语、叙事、框架等观念性因素虽然在影响人类行为中具有直接意义,甚至建构主义者将其上升到本体优先的地步,但在承认观念性力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物质性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本体优先性。也就是说,决定舆论博弈成败的并非舆论战本身,况且舆论博弈也不是根本目的,事实层面的支撑远胜于舆论博弈的结果,而且事实层面的社会运动的存续与发展才是根本目的。例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拓展以及中国对世界的突出贡献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不会因西方的对华污名化而凭空消失。因此,中国在构建对外叙事主体性框架、做好国际“联合—分化”工作的同时,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项“社会运动”得以存续和发展。

当前,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理念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实施框定的深层目标在于通过一定的舆论策略破坏中国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升级与中国的对抗形势,试图在全面冷战式对抗中造成中国“战略透支”,破坏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目标。处在如此严峻复杂的“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sup>⑤</sup>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指导下,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理性应

① 参见潘兴明:《南非:非洲大陆的领头羊——南非实力地位及综合影响力评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1—124页。

② 参见《李强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并发表讲话》,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972.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972.htm);《〈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进展报告〉在北京发布》,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479.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7479.htm);《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新华社,[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69.htm](http://www.news.cn/2022-09/17/c_1129009769.htm);《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全文)》,新华社,[http://www.news.cn/world/2022-06/24/c\\_112877100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2-06/24/c_1128771000.htm);《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全文)》,新华社,[http://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http://www.news.cn/world/2023-05/19/c_1129629700.htm)。

③ 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

④ 参见杨光斌、秦亚青、阎学通、朱峰、唐世平、张宇燕:《笔谈: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2期。

⑤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25/content\\_5537101.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8/25/content_5537101.htm)。

对来自西方的舆论攻势,避免陷入螺旋上升式的舆论漩涡之中;在此基础上,中国更应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的进程中增强抵御西方框定中国及中国理念的战略底气。在推进民族复兴进程、增强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中国也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sup>②</sup>,以实际行动回应西方对华认知偏见与污名化行动。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Chinese solution proposed by China to solve global problems. While China's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gaining popular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has also been negatively fram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ak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s an example, the West has determined that the concept is a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s quest for world hegemony. On this basis, it expects to leverage it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hegemony to resist the global spread of the Chinese concept and mobilize the forces of the West and eve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afeguard the so-cal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 terms of its impact, the Western countries' framing of Chin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ideas has shown the tremendous manip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a-related public opinion, which has damaged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Responding to this, China should start by revealing the truth of Western framing. It should not only build a subjective framework centering on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ut als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ideas. It should also embrace countries with a similar narrative framework to China to form a joint force against the Western framing. More importantly, China should stick to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break the illusion of the Western anti-China forces to obstruct China's development process.

(蔡文成,教授;牟琛,博士研究生,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00)

[责任编辑:于红]

---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页。